

天视之我民视，天听之我民听。

——《周书·泰誓》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道得众 则得国 道失众 则失国。

—— 曾子

引言 走向社会舆论的纵深

地震来临之前，伴随刺眼的地光发出呜呜的地声；瓢泼大雨即将倾泻，先是一阵雷鸣电闪、怒吼嘶鸣的狂风……凡破坏性自然现象的袭来都给生命世界一个天赐的警告，这也许是自然界对人和动物的厚爱。由此激发了我的玄思：人类社会常常受到人为的威胁，甚至人类给自己制造灭顶之灾，有没有一种警示的声息告诉人们，社会是安康祥和还是危机四伏？有，这就是社会舆论，我把它视作社会声纳系统。

人民的情绪、意见以至行为构成了社会运动的发声器，它时时预报社会的进程或险境，似乎是一种“天理”的昭示。人民在想什么？人民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些活生生的社会舆论话题，是民心的再现，它们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中国的未来。

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人民群众始终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但人民

中每个成员不可能直接掌握政权，站在领导岗位亲自决定政治、经济及其他重大事务。他们只能通过舆论活动表达自己的意志，使执政者在国家管理中充分体现这种意志。不言而喻，把握社会舆论是政权反映亿万人民实践活动、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是执政者联系群众的科学方法。而这一方法，过去未曾被我们所注意或很好地运用。

国情和民意是权力机构制定决策的依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人民之所想 急人民之所急”的口号 教育上一代人树立了“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观，使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凶顽的敌人和种种困难 夺得了天下。毛泽东认为 这是“人心向背”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个不善体察民情的政府，不会是卓有成效的政府；不能尊重民意的政府，必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忽视民意、压制不同意见的历史教训，虽被一些人所淡忘，但重新审视它仍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在意识环境走向宽松的时代，对历史舆论悲剧的回顾，有助于人们珍惜思想解放结出的灿烂硕果，也有助于抑制扑灭意识创造之火的蠢蠢欲动。我们的研究带有某种警示的意味，以便使国家免遭极“左”年代那种骇人听闻的浩劫，使人民公仆更多地倾听人民的声音。

作为天理民心的人民呼唤，是社会的晴雨表，要求政治家必须履行自己的崇高职责，经常到舆论的社会之镜前照照自己：凡符合人民利益的事，要克勤克俭地去做；凡人民深恶痛绝的丑恶现象，要坚决制止和铲除。

本书不想进行不痛不痒的纯理论探讨，那样固然轻松省力，但无助于认识现实中的痼疾和舆论芒刺的愈合力。我们要做的是把理论探索推向现实生活的土壤，触及那些最头疼的社会沉疴 我们的哲学是实事求是 敢于面对一切挑战。

对中国当代舆论的研究绝不是抽象地证明哪些上头精神符

合舆论，也不是教人如何大造舆论，当然，这也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为鉴，告诉人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丑恶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富强、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引自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从历史和现实舆论的警示中，寻求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前进方向，正是本书作者的最大希冀。

学术普及工作的唯一目标是使学术著作让普通老百姓读得懂，也愿意读。特别是对重大科研课题，通俗化和意兴淋漓博得的广泛嗜读的效果，将使学术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学术研究单从前人的书本里寻找自己所需要的词句，进行主观的判断和论证，只能说是旁门左道。现代学术发展的主流是审视前人的观点，殷切地探索现实，以丰富而可靠的事实烘托真理的延伸。一些不了解现代学术的发展趋向、甚至连现代学术的门槛都没有进过的人，却将新兴的准学术著作斥之为“不严肃”、“上不了档次”、“真令人啼笑皆非。”准学术著作“在这里是个谦词，是时代发展和大众掌握理论需要的产物。而那些为大从所不理睬，出版后仅能售出上千册甚而只有数百册的脱离人民生活和社会运动的陈旧的社科学术书籍，却被某些人视为“珍品”，这实在是一种顽愚的无知。

本书力求从象牙塔的空话和套话的迷阵中走出来，以准学术著作的风格奉献给大众和公仆们，同时也希望得到各届人士的指教。

舆论一律一经曲解并被当作大棒挥舞，便成为套在人们说话器官上的紧箍咒，很难一下子改变。群众的意见被压制，终于引出一个多事之秋。

当几百万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按照毛泽东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表达他们对官僚主义愤恨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政治地震发生了。

这是一场自我走向反面的红色恐怖，是暴徒得势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是愚昧最感光彩的年代。

从舆论和谐到舆论震荡

当社会关系和周围环境危如累卵，作为社会声纳的舆论就会击鼓鸣钟，不断发出不祥的信号。反之，当社会出现繁荣昌盛，社会舆论就会口碑载道，颂歌嘹亮。从天理或民心的意义上认识舆论，就能迅速感知社会的骤变，把握社会发展的进程。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历史时期，但在某些地方，社会

舆论的震荡时有发生。对此，许多人常常陷入困惑，不断发出长叹：舆论是什么？真是不可名状！

1996年9月27日上午，邵阳市红旗路有一支庞大的迎亲车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恰好该市市长孔令志路过这里，见到用这么多公车迎亲，不禁怒火中烧，他跳下车拦住了车队。当他查至一辆桑塔纳轿车时，司机不肯交出驾驶证，问其是不是公车，回答“是”。孔令志顿时火起，手持警棍朝挡风玻璃猛击。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达200多人。孔令志即席向群众高声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我不是欠冷静，而是太激愤。禁止公车迎亲，纪检监察部门有明文规定，群众有强烈要求，有的人就是不听，顶风作案。我今天砸了这台车，表明政府对老百姓反感的丑恶现象敢于碰硬。对于群众反应强烈的事不敢碰，你们还会相信这个政府吗？”他的话音刚一落，市民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激动地高呼：“人民政府万岁！”

亲临以上事件的许多人称，他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舆论，知道了舆论究竟为何物。但他们看到的并不是舆论的全部，仅凭感官也不能意识到舆论的真面目。舆论的威力让人触目惊心，它的执拗与纷杂又使人痛不堪言。正义的舆论总是主宰社会情绪，摧枯拉朽；错误的舆论则虚张声势，不攻自破；不祥的舆论一旦风起，则人心惶恐，进而引发轩然大波。

从1949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建立后，共和国保持的舆论平静是短暂的。数年后，社会情绪的复杂变化不断引起意识波动，应验了毛泽东后来所下的“过七八年来一次”的断言。90年代初，中国高层向宣传界发出告诫：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

人 促进社会的政治稳定 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舆论和谐：昙花一现的美好开端

无论是勒朋还是奥尔波特，都没有在其精深的著作中论述社会情绪的结构，也许，在社会心理学家那里这是无需探讨的课题。但，正是这一课题所隐含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一次次社会革命，一场场政治争斗和经济变革。即使在狭小的社会环境中，忽略了周围人的共同意见，也会由于无视自己言论的接应点而陷于被动。把社会舆论的内涵把握在“由多数人的集合意识而形成的共同意见”的界定上，才能认识中国近 50 年来社会舆论的发展轨迹。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的气氛和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满面春风，是那么交相辉映、和谐一致，以致整个五彩缤纷的环境都和人们欢乐的情绪融为一体。这是共和国初创时期社会舆论的写照。

新中国的建立，并不像西方预言家推测的那样，已陷入重重的负担中。不错，当时中国确实需要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众多困厄，但中共赢得了最殷实的一个收获，即它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好感和欢迎，这种普遍情绪继而化为社会舆论的盛赞。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歌曲迅速而广泛地流行起来，说明这种舆论盛赞达到瑰玮的境界。可以说，从 1949 年至 1956 年 中国 社会 舆论 的高度和和谐，来自社会情绪的协调和相容。

舆论和谐是建国初期的主要舆论特征。共同社会意见伴随新生活的气息，使举国上下沉浸在治理战争创伤的伟大事业中。接收、改造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利用、限制民族资本 镇压土匪恶霸 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 三反五反 稳定物价 恢复千疮百孔的

经济……这些石破天惊的举措，利国利民，人民对一切都似乎满意到了极点。人们高唱从陕北传来的乡土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尤为高亢，全国人民的情绪牢牢地归系为同一个方向。甚至改造拥有几十万人口的私有工商业，都没有发生重大波折，敲锣打鼓的报喜，欢腾雀跃的游行，曾把社会情绪推向欢快的高潮。

人民群众对社会地位和生活目标的向心力，浸润着相互认同的理解。近 99% 的中国人从新生政权的诞生看到希望，得到好处，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人民享有政权，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公民的正当要求不受压制，社会情绪及其舆论就处于稳定、协同状态。中国共产党及军队的干部、战士特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严明的纪律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顺乎天理、合乎民心，使中国人民耳目一新，深怀崇敬。许多华侨和留学生纷纷回国，中间政治力量，包括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人要求重新学习，改造思想，适应变化的形势。社会的公正、执政者的廉洁、生活的提高、新的人际关系的建立，给社会情绪相互融通注入活力，相伴而生的舆论也就展示出和谐的风采。

1952 年 1 月 5 日，新疆乌恰县一个牧场的两位妇女在十多天中，一针一线地绣完了一幅宽二尺、高三尺的毛主席像。这一消息一传出，牧场周围百里地区的男女农民和牧民，都骑上牲口赶来看。四百多个柯尔柯兹族农民、牧民就在毛主席的大绣像下，隆重地举行了庆祝会。大家弹起“哈巴拉（一种乐器）尽情地歌唱，欢乐地跳舞。两位绣像的妇女，扬声高唱“浑河的水流不尽”。大家群起合唱：“毛主席的恩情说不完。”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所有的街道广播器、收音机在下午一时，传出了全部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获得批准的消息，顿时全市欢声雷动，锣鼓喧天，人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鞭炮燃放起来。全市十多万工商业户立即换上了冠有“公私合营”字样的新牌子，新装的霓虹灯和各种彩灯大放光明。

数不清的报喜队出动了，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高举毛主席的像和“喜”字，配着腰鼓、乐队、龙灯和彩车。全市纵横总长1300多公里的大小街道上，红旗、彩旗、彩灯一望无际。“庆祝上海市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横幅挂在十多层高的大厦上，或横跨在马路上空。所有的商店都张灯结彩，用“喜”字、彩花装饰了橱窗。

当时，国人都像新疆乌恰县的农牧民和上海市民一样，竭诚拥戴共产党的领导，整个国家沐浴在舆论和谐的端阳中。民心这东西很怪，总是围绕权力中心旋转，歌颂、欢呼它的恩泽，揭露、斥责它的倒行逆施，有时又专门和掌权者作对。社会管理者的行为略有不检，人民双目所见，感受在身，便情绪大作，诉诸愤世嫉俗的舆论。毛泽东与中共第一代领袖们稔知这一法则，当刘青山、张子善腐化堕落的罪行一败露，就断然处以极刑。这一举动的舆论效应在当时也许被人所料不及，但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共是人民的公仆，不是鱼肉百姓的官宦老爷。许多民族资产阶级和从旧官场走过来的人为此大为感慨：“中共领袖不是李自成！”

建国初期社会生活的简单化，使社会情绪更加趋于纯正、平稳。人民收入的平均倾向，为国家而工作的生活目标，使人人都渴望成为一个新人，没有那么多头疼的社会问题骚扰思绪。由

于没有那么多产生舆论歧见的社会矛盾，人们便把精力集中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平稳物价和抗美援朝这一大局上。在语言交往中，敏感问题、焦点问题的概念不曾被任何人使用过。在这种社会基床上舆论同社会情绪一样，不会轻易失去和谐的基调。

就本质意义而言，舆论和谐应是当代中国社会日常意识的主线，因为社会各种组织和群体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盘剥与压榨在共和国诞生的那天就被开始埋葬了。这是社会舆论和谐的根本法则。

政府和公众意见的一致性，表现为上层和下层意见的融合，这种舆论同化是社会维持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社会制度陷于腐朽、衰亡的泥潭，国家行政机器又不能有效根治死亡病症，下层意见就会直指上层意见而产生舆论冲突，按社会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人民不断发出天理民心的昭示。

在中国，作为群众舆论的下层意见，是建设新生活的重要财富。“群言千金 妙论兴邦。”人民群众发表意见 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侃侃而谈 呈现出一种“自我赋予、自我决定”的取向。如果人民群众能够畅所欲言，随时发表各种意见，社会舆论就要形成波澜壮阔的观念活动。

公众舆论不是乱七八糟的意见，个人或几个人的意见还不能称作舆论。个人意见和广泛的群众意见趋于统一时，个人才成为公众舆论的代表。我们阐明这一观点不是无谓之举，因为人们把握社会舆论，并不像坐在剧院观看大合唱那样能够听到、看到“万众一辞、异口同声”的壮观景象。感受公众舆论总是先从一个或几个人那里听到议论，然后才慢慢领悟社会舆论的底蕴。

与下层意见并存的是社会上层意见。在中国，上层意见绝不是指其他社会制度中巨富大亨、达官贵人及上流人士的声音。

它具有特殊的内涵。在新制度下，不应延续人的社会地位的等级，人人都是社会公民，不同的仅仅是每个人的职务及其责任的高低大小不同。直接掌握各种权力的领导者构成了一定意义的上层人员，虽然他们在政治上与群众是平等的，但在管理工作中却处于统领、指挥的地位，形成一个高于下层群众的管理者群体。上层管理者在制定政策、发布指令、指导基层工作时形成了理性色彩更浓、更加强有力的观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层意见。

上层意见不像公众舆论是以一般议论的形式出现，它也不像群众意见那样分散、杂沓、多变。它反映着国家上层建筑的政治观 表现为整个社会的经济观与思想体系 把国家机构、体制、路线、方针、政策和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通过各种宣传活动再现出来。一个稍有级别的行政干部发表的谈话，向群众许下的诺言，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在群众看来是代表上层意见的；被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介发表的各项公告、时评和领导人的讲话更是上层意见的集中体现 甚至一位市长、县长带有‘上头精神’味道的讲话，也常常被群众理解为上层意见。

上层意见往往是权威性观点，因此人民通常对它不加怀疑。几乎每一个新国家在创建初期，国内局势都十分稳定，上层意见很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舆论的和谐便表现得异常明显。可是，一旦社会管理者的情绪发生问题，他的政见常常走样，上下层意见的和谐就会不断发生故障，难以维持长久。

然而，社会现实的错综复杂，上层公职人员个人的偏激、轻浮、自大和对对方政策的教条化理解以及制定政策的“左”或“右”的倾向 往往使上层意见违背群众的普遍意志 造成上下层意见的误差。

50年代中期，合作化的冒进政策在农村产生忧虑情绪，农

民叫苦不迭 对“土地入股 土地归公”议论纷纷，一年内消灭小农经济的超级幻想在广大农村引起风波。上层意见却恰好相反 对广大农民的正确议论斥责为“富农倾向”把反冒进的人视为“小脚女人”；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 好行小惠”。上下层意见的误差日趋扩大，广大群众畅所欲言受到压制，公众舆论便以隐晦的形式对抗上层意见，建国初期舆论和谐的堤坝逐渐被冲开缺口。

“舆论一律”的萌生

50年代初 舆论和谐曝露出的政通人和的政治景观，容易让人产生最荒唐的误解：偃平中国只有一种声音，只允许用一个腔调说话。首先是一些掌权人，对来自民间的不同于上层精神的意见 视为唱反调，对抗领导。许多刚刚翻身的群众也常常对不同于上级指示的意见，产生莫名其妙的警觉：他是不是反革命？！把和谐曲解为“舆论一律”则是以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为前提的 这种言论枷锁一旦形成，便开始扼杀勃发不息的舆论生机。

1951年，武汉市卫生局有人给该局副局长宋瑛提意见，宋瑛毫不理睬，此后，有人化名陈颉给毛主席写信检举宋的错误行为。最后，信转到武汉市委，市委要求宋瑛作检讨。宋瑛不仅不作反省，反而在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的支持下，操纵卫生局党总支追查检举人，并诬告检举人盗窃公款……这类压制不同意见的事件于解放初期在各地时有发生。“老子革命有功，少说三道四！”这在当时成为某些干部的口头禅。“舆论一律”似乎在打破舆论和谐，悄悄地蔓延着。

两年后，发生了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

社会秩序”的党内事件。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刘少奇在两次报告中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是犯‘左’倾的错误。”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毛主席表示赞同他的观点，还特别补充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1949年4、5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4月上旬的一天，他发表讲话说：“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就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也有个别言词不妥，比如讲“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就不妥当。毛主席对他在天津的讲话总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①

可是，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批评了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并给他戴上了右倾的帽子。毛主席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46—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①

毛泽东的上述批评受到中央其他领导的支持，刘少奇也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意见。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一初次分歧，还谈不上“舆论一律”，仅仅是不同意见的讨论。当初多数中央领导人赞成刘少奇的讲话是正确的，并认为起了积极作用，建国40多年来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刘少奇的意见正确，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步子实际是从刘少奇当时的论题下跨出的。然而，毛主席的批评尽管不符合中国国情，大家却和他保持了一律，是他的崇高威望使然。而这种威望一旦失去分寸，“舆论一律”的萌生就带有强制性了。此后的历史进程说明了这一点。

这里不能不提到当代中国意见领袖的杰出代表梁漱溟先生。也许正是因为他1953年就被打翻落马，一直赋闲在家，才使他有幸免去了后来的灾难。50年代初梁漱溟就关注中国农村问题，希望新生政权不要忽略农民，力主改变几千年农村落后的面貌。他的言论具有为国分忧的胆识，也有击掌警醒的意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

味。

1953年9月9日，北京正在举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梁漱溟是会议列席者。在小组讨论会上他主动要求发言，他说“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就能倍增”。我想重点提出的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9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从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入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就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艰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①

40多年前梁先生的这番话，具有不可辩驳的历史远见，表现出杰出意见领袖的睿智。梁先生出于对农民命运的担忧，坦诚建言，口气平和，没有任何恶意。作为一名党外人士和政协委

^① 《梁漱溟问答录》第13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员，他完全有资格、也有权利在会上发表这种意见。他是否自命为农民请命、为农民立言，我们不得而知，但在30年代，他曾为中国的“乡村建设”四处奔走，著书立说，他的上述建议不能和他的特殊经历和学术背景有关。另外，梁漱溟在人格方面具有外向的自主性，遇事不愿沉默，惯于以耿直的言辞表露心迹，这符合毛泽东提倡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共产党人的胸怀，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次建言却遭到公开的羞辱。

梁漱溟发言这天，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当天晚上，毛泽东或许看到了简报，或许听了有关负责人的口头汇报，认为梁漱溟反对总路线。9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梁漱溟，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泽东的激动，使他失去了冷静，进一步发挥说：“蒋介石是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还说梁“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①

梁漱溟听完毛泽东的这些话，甚感意外，极不服气。他想，我何曾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实际是拥护总路线的一员，只不过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损总路线，有损工农联盟。梁漱溟一面想，一面提

^① 参见《梁漱溟问答录》第128—129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7—115页。

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的，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不在场，希望毛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 以示指教 解除误会。

梁漱溟对真理的追求百折不挠，以致质问毛泽东有没有雅量，并坚持说：“我现在的思想考察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此时 会场大哗 许多人呵斥起来 说梁某人胡说八道 民主权利不能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言时间，又不肯讲出自己的意见，最后被轰下台。

梁漱溟的言论引起许多人的愤慨，受到了批判，被指责为“狂妄之极 反动成性”。这场由正确建议引起的轩然大波 固然和梁后来的言词偏激有关，但压制言论的冲动不能不是根本原因。毛泽东的冷嘲热讽，其他领导同志强硬地取消梁的发言权，首开了“舆论一律”的先例。这也许是压制不同意见的开端，历史正是从这一时刻起时而偏离舆论的正确方向。这场意见交锋已过去 40 多年 孰是孰非 已十分清楚。直到 70 年代末 中国广大农村还处在贫困的边缘，破败的草房，农民一张张面带饥色的脸孔，足以说明这场争论的真理究竟在哪一边。

“舆论一律”信仰和政治高压的混合体

“舆论一律”的概念是由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提出来的，后来毛泽东把它的含义作了不容置疑的解释，但许多人对它的理解却大为离谱。本来，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在人民内部允许舆论不一律，而对反革命分子则要实行舆论一律，不许他们乱说乱

动。可是 如果把‘反革命’的界定拉向思想领域；‘舆论一律’的滥用就不可收拾。许多人，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有时也把“舆论一律”演义为不同于领导者的意见都属反革命论调，不准其直言不讳。

在 1953 年、1954 年，文艺界曾就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问题，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辩论。开始还富有学术自由讨论的气息 到 1954 年末这场论争终于白热化，干脆剥夺了胡风等人的发言权，他们的一些反驳文章难以发表，使他们遭到舆论一律的制裁。

胡风在文艺论争中面对‘当权者’（指当时文艺界领导）政治上的优势 既不屈服 又感到对手是一个“庞然的存在”。由于最后发表反驳对方观点文章的权利被注销，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愈加强烈。胡风和他的一些亲密的朋友没有公开发表言论的场所 便只好在互相往来的信件中商讨对策 发牢骚 说怪话 使用一些隐晦语言。例如“两位马褂”（指何其芳、刘白羽）、“豪绅们”（指当时重庆进步作家）、“官们”、“权贵”、“老爷们”（指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抬头的市儈”（指茅盾）、“跳加官”（指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充满讥讽、憎恶的语言，例如：“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要做商人 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 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 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信中这些仇视字眼儿，带着憎恶的感情 引起文艺界的警觉 有人把胡风写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这些信件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在周扬的信上指示并改写了按语，即 1955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胡风的这些信件被公之于众，使举国大为震惊，遂被定为胡风反革命案件。“舆论一律”把舆论逼进暗流 变成一股地下水 使胡风们用